

研究

建设“文明生态村”

韦廷柒 李伟南 陈玉梅 著

JIAN SHE “WEN MING SHENG TAI CUN” YAN JIU

——以海南省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为例



建设“文明生态村”研究

——以海南省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为例

韦廷柴 李伟南 陈玉梅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建设“文明生态村”研究 / 韦廷柒, 李伟南, 陈玉梅
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219-06310-1

I. 建… II. ①韦…②李…③陈… III. 乡村—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研究—文昌市 IV. X321. 26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9911号

责任编辑 吴春霞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址 <http://www.gxp-ph.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南宁市和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08年8月 第1版

印次 2008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9-06310-1 / F · 772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口环境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不论对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认识，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不言而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发展课题。

生态文明的研究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成果丰硕。从学科领域看，其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化学、技术学、美学等几乎所有学科；从内容上看，其研究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全面展开；从质量上看，其中不乏优秀的成果和新颖的观点。但是，以某一个地区作为文明生态建设研究对象的成果却很少见，而一个地区的文明生态建设又恰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国地域广阔，生态环境万千，区域差别极大，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搞“一刀切”。以某一地区为创建生态文明村为具体研究对象，

从中总结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经验，并以此为我国其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对当前我国政界和学术界研究来说尤为重要与迫切。海南省文昌市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同样有海积平原、丘陵地带，甚至有小部分山区。特别是近年来，海南省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建设成效明显，以这样的个案特殊地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对象，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读罢《建设“文明生态村”研究——以海南省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为例》书稿，我认为它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视角新颖。该书借鉴国内外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最新成果，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海南省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特色、效益、经验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全面深入分析，阐发了建设生态文明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论述了加快海南省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发展进程，使之成为我国创建文明生态村的范式。这种从微观视角，个案研究的思路，对研究文明生态村建设来说是十分新颖的。

二是观点鲜明。该书总结海南省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实践，总结出独特的以创建文明生态村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昌模式”。这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友好相处、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改变村容村貌和整治生存环境为切入点，以经济发展、村民富裕为主要内容，以高水平的生态文明、村风文明为特色，以村治民主的制度建设和保证，以统筹发展手段，地方政府、干部和村民三者利益有机统一的文明生态村建设模式，在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中很有特色。

三是主题突出。该书从文明生态村的由来、内涵、标准及发展现状作为切入点，考察分析研究海南省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的理论背景、时代背景、人文背景、国外农村发展模式及启示；围绕创建文明生态村的实践过程、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特色与效应、“文昌模式”与科学发展观、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经验和启示等一系列问题，层层展开分析。研究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精致、知识性和可读性强。

四是方法独特。该书采取综合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区域特点和个案，力求把宏观与微观研究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当前海南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的分析，对基础条件、结构因素、制度环境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创建文明生态村推进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和途径，研究方法很独特。

韦廷柒、李伟南、陈玉梅三位学者的研究颇有特色和新意，该书是当前我国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一部优秀论著。我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专著。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生态文明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1)
一、国外有关生态文明研究成果综述	(1)
二、国内有关生态文明研究成果综述	(18)
第二节 本书研究内容及结构	(30)
第二章 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的背景	(32)
第一节 理论背景	(32)
一、文明的本质特征及结构	(32)
二、生态文明	(38)
三、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	(52)
第二节 时代背景	(57)
一、国家“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战略构想	(57)
二、海南省“建设生态省”的科学抉择	(61)
第三节 人文背景	(64)
一、文昌市的人文条件	(64)
二、创建文明生态村前的文昌农村	(66)
三、文昌农民的基本需求	(67)
第四节 国外农村发展模式及启示	(69)
一、生态村建设的发端	(70)
二、德国的生态村	(71)
三、“不丹模式”的启示	(73)
四、韩国的“新村运动”	(75)

第三章 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的实践过程	(77)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的由来及内涵	(77)
一、文明生态村概念的形成及演变	(77)
二、文明生态村的科学内涵	(78)
三、文明生态村的标准	(81)
四、文明生态村建设的发展阶段	(83)
第二节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实践过程	(84)
一、指导思想与总体目标	(85)
二、文昌市创建文明生态村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	(86)
第三节 文昌市典型村的创建实践	(89)
一、培龙村	(89)
二、三多村	(91)
三、美柳村	(93)
第四节 文明生态村建设活动的升级——白鹭湖文明生态片区建设	(95)
第四章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的特色与效应	(99)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的巨变	(99)
一、“三大跨越”	(99)
二、“五大转变”	(100)
三、“五大变化”	(103)
第二节 文明生态村的文昌特色	(105)
一、注重生态文化建设	(106)
二、培育文明村风	(108)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	(110)
第三节 文明生态村的效应	(112)
一、社会效应	(112)
二、经济效应	(113)
三、政治效应	(114)
四、文化效应	(116)
第五章 “文昌模式”与科学发展观	(118)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本质要求·····	(118)
一、科学发展观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118)
二、科学发展观是以发展为主题的完备理论体系·····	(130)
第二节 “文昌模式”是农村发展的典型模式·····	(142)
一、“文昌模式”的内容·····	(142)
二、“文昌模式”是农村发展的典型模式·····	(143)
第三节 “文昌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载体·····	(157)
一、“文昌模式”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永续发展”·····	(157)
二、“文昌模式”的核心是“以农民为本”·····	(159)
第六章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162)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62)
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162)
二、创建经费投入不足·····	(164)
三、思想认识水平亟待提高·····	(165)
第二节 文明生态村未来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难题·····	(166)
一、“四个文明”建设并举与实际能力有限的矛盾·····	(166)
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167)
三、文明生态村建设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矛盾·····	(168)
四、文明生态村建设过程中的“点”与“面”的矛盾·····	(169)
第三节 对文明生态村建设未来发展的建议·····	(169)
一、培育新型农民·····	(169)
二、发展现代农业·····	(174)
三、协调好“四个宏观关系”·····	(179)
四、处理好“四个微观关系”·····	(184)
五、坚持“以人为本”·····	(186)
第七章 文昌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188)
第一节 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经验·····	(188)
一、优先发展生态文化建设,注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189)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	(192)
三、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循序渐进的科学方法·····	(194)

四、改革体制、创新机制的组织保证·····	(195)
五、整合力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97)
第二节 文昌经验的启示·····	(199)
一、转变观念、创新理念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200)
二、改革干部体制，是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地方 善治的关键·····	(205)
三、坚持“以农民为本”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灵魂·····	(205)
四、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农村善治的根本保证···	(207)
参考文献·····	(212)
一、专著类·····	(212)
二、论文类·····	(216)
三、地方材料类·····	(220)
后 记·····	(22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生态文明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一、国外有关生态文明研究成果综述

(一) 关于生态文明和文明观的研究

生态文明思想发端于生态与环境问题,它引发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而产生了生态文明观并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最终指导人们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以取代工业文明社会。

工业文明时代,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基础上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文明观,把人类行为导向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和肆意破坏,科技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物种减少、人口爆炸等全球性难题迫使人们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反思,开始了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探索之路。西方学者对生态文明和新的发展观、价值观、伦理观、消费观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针对“天人对立”观日益显露出来的弊端,人们对传统的自然观、伦理观进行了反思。1923年,法国哲学家A.施韦兹发表了《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主张将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应尊重所有的生命和自然界。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威斯康星大学的莱奥波尔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1933年,美国生态学家A.莱奥波尔德发表了《大

地伦理学》，提出了现代环境伦理学思想。他认为，人类除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两个伦理层次外，还出现了第三个伦理，那就是人和大地的互相关系。这一层次的伦理关系认为，人应当改变其在大地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地位。他提出的伦理学思想当时没有被社会接受，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轰轰烈烈的世界环保运动中才被重新发现。

1962 年，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人类将生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书中，卡逊根据大量事实科学论述了 DDT 等农药对空气、土壤、河流、海洋、动植物和人的污染，以及这些污染的迁移、转化，从而警告人们：要全面权衡和评价使用农药的利弊，要正视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卡逊不仅威胁到了生产 DDT 的化学公司的利益，也威胁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主义自然观。科学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论、还原论的牛顿经典物理学模式之上的，它将自然看成一架遵从单一规律的运转精良的钟表，人可以洞悉其全部规律，也对它拥有无上的权力就可以无限地开发和索取。在这种伦理观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只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可以克服的，而卡逊则直接指出了这种伦理观的荒谬及后果。人必须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古老的自然哲学重新复活，在生态哲学中得到延续，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科学——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雷切尔·卡逊的小说从被攻击到被肯定，直至被认为和“日心说”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视为“绿色圣经”，她本人则被称为现代的哥白尼。

从 1972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人们一方面加深了认识，另一方面探究其原因，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实践，并且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和行动。在 1972 年召开的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口号。这一时期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只有一个地球》、《增长的极限》等“绿色圣经”。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等的发表，促使绿色和平运动进入了高潮。罗马俱乐部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增长是有极限的”，并用发展的概念取代了增长的概念，还用动态平衡规律取代了单纯

增长原则。该报告认为,地球上的各种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支撑未来长远的发展,人类必然走向有机增长的道路,建立稳定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增长,以达到全球均衡,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自此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其核心之一就是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生态文明意识逐渐在世界不同民族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产生。人们不再盲目追求增长,而是探求可持续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飞跃,它体现着人类在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可持续发展视为一种新的文明观。

20世纪90年代,世界环发大会和《里约宣言》的发表,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的开篇所言,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生态文明虽然刚刚露出端倪,但必将发展成为21世纪社会文明的主流。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他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说道:“地球上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稀薄,保证地球上人类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人们认为,就生态谈生态,就环境谈环境的思维方法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发展理念和模式不当引起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模式来解决,所以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实践,同时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如城市生态学、工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生态

法学、生态教育学等，并且得到迅速发展，这就为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生态危机问题，当代世界曾经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预警危机将会发生，即所谓“悲观主义”的观点，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代表；二是乐观主义观点，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 H. 卡恩的“大过渡理论”为代表。

（二）关于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体现时代特点、顺应发展趋势、符合国情、民情基础上的发展观。

纵观世界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中都经历了各自特殊的发展历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发展，战后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在谋求发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也在不断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社会制度不同，各国的情况不同，但发展以及发展的问题，几乎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共同性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谋求战后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种研究发展的理论便应运而生。“发展”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仅就理论流派而言，就有发展纯理性学派、心理学学派、传播学学派、社会学学派等。新的发展学科更是层出不穷，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美学，以及未来发展理论等。这些不同的学科，虽然其研究的专业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视角却一致，即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上。在这诸多的发展学科、发展理论中，有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森斯坦等人的“大推进平均增长理论”，还有“基本需求论”、“增长公平论”等。在未来学和经济的发展理论中，有战后初期的“经济增长论”、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卡恩的“大过渡理论”、托夫勒的“权力转移论”等。总之，发展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很复杂的局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中看出当代发展理论的一般情

景,就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线索而言,大体上是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到“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论”,以及相伴而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历史演进过程。大体说来,国外的发展理论依据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发展观:

1. “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即经济发展观,它是发展观的最初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发展观上的反映^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产物。这种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就是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将经济增长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其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是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高投入,社会发展理论的经济化倾向异常突出;二是把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具体表现为对GDP的过分追求,用GDP和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替代了其他所有的社会发展指标,把国民收入的增长当成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的唯一硬性指标,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精神要素以及社会与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综合优化作用;三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主宰,把大自然作为人类可以任意掠夺、占有和宰割的对象,为了提高GDP增长指标,不惜以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为代价。

“经济增长论”在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在经济发展的起初阶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发展学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然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实为“增长经济学”。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提出了若干经济增长模式。但当时一般学术界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认为“发展=增长”。经济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只有经济增长了,社会才能进步,并且,只要经济增长了,社会就一定会进步,它表现在发展实践中,就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偏好和追求。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刘易斯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思想。例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论》的主要观点

^① 祝黄河:《论社会发展观的生成与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5),5~9页。

就是将发展、现代性的本质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将发展经济学所指认的经济增长理论等同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虽然有学者不断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如缪尔达尔于 60 年代提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70 年代的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则提出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概念。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一观点一直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同。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是一切发展的核心，只要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落后国家大多沿袭发达国家的老路，强调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第一”的传统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并继续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日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仰慕和竞相模仿的对象；亚洲“四小龙”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这种争相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竞争中，世界经济从总体上获得了超越任何历史时期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增长”的观点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却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问题，带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严重后果，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虽有较大程度的增加，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反出现了诸如人口膨胀、过度城市化、社会政治动荡、分配不公、社会腐败、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和矛盾。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也许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矛盾’根源，而这一矛盾也许是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的祸根。”^①经济发展观决定了发展目标的单一、发展模式的畸形以及发展结果的片面，常常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的严重后果。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或唯一的尺度，其基本理由是认为只要社会财富增加了，国家就富强了，人民的生活就提高了。但实际的结果表明，仅仅是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

^①（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296 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社会的主要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确实是增长了，但社会的贫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被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大部分穷人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甚至连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正如社会学家迪文和利文斯顿在《替代发展战略与适用技术》一书中提出的：“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战略，必然是想方设法去生产像电冰箱、空调、汽车以及豪华住宅一类奢侈品。而这不是穷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像粮食、衣着和住房。也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穷人最起码的生存需求的满足达到何种程度。”虽然随着经济的增长，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会有所提高，但他们所得到的好处是有限的，大部分的财富被少数人拿去了。而经济增长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则反映不出这种情况，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加剧的事实。同时，经济高速增长还加剧了通货膨胀，扩大了失业，从而又使穷人雪上加霜。

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还造成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分离。一方面，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却越来越匮乏。一方面，人们都在疯狂地追求财富，追求高消费，追求超级享乐；另一方面，人们又失去了精神的追求，失去了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于是，各种颓废、丑恶的社会现象开始泛滥，出现了“垮掉了的一代”。在这种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指导下，为了维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只能是千方百计采用各种手段来刺激需求，如广告的狂轰滥炸、产品的花样翻新、消费支出的预先支付、一次性消费的大行其道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刺激手段，造就了大量虚假的消费需求，最终结果是物质资源的过量消耗和惊人浪费、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

这些负面的作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是制约和决定一切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一旦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追求生存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则成为这些后发展国家的首要任务，并且越是落后国家，对于发展的理解就越是倾向与经济增长简单地等同。正因为如此，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甚至成为唯一目标，几乎是一切后发展国家在现代